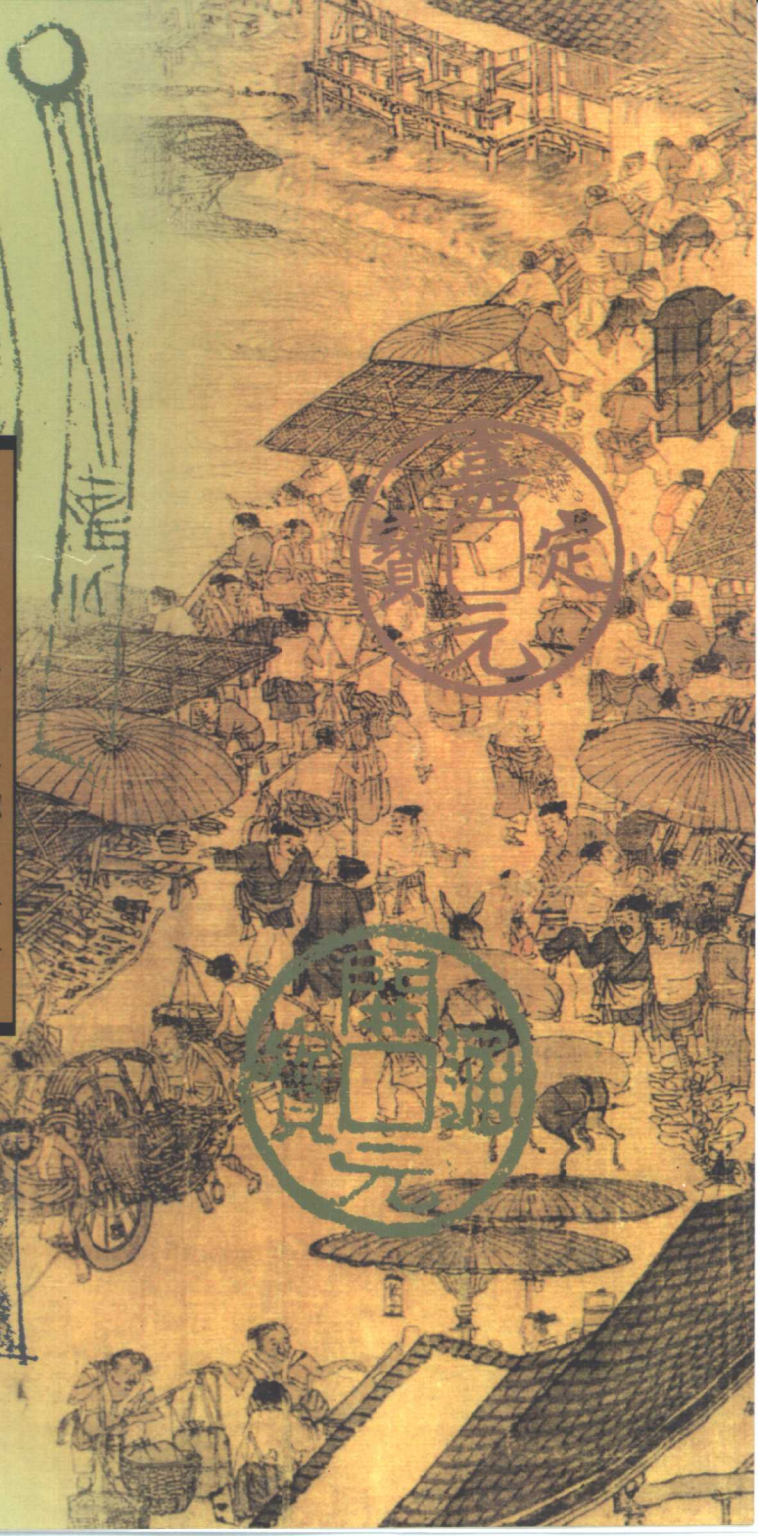


冷鹏飞 著

中国古代社会 商品经济形态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 商品经济形态研究

冷鹏飞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冷鹏飞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3

ISBN 7-101-02906-X

I. 中… II. 冷… III. 商品经济—研究—中国—
古代 IV. F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153 号

责任编辑 薛有红

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

冷 鹏 飞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3¼印张·325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26.00 元

ISBN 7-101-02906-X/K·1231

本书为国家社科课题,由湖南师范大学
及“湖湘文化研究”学科资助出版。

序 言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按照其对交换的依赖程度,划分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大类。而商品经济形态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为内容,与货币经济相交融为典型特征。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来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已萌生,并随着古代社会的发展日益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我国封建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然而,我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始终未能瓦解自然经济从而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由此导致我国古代社会经济长期缓慢发展,近代社会经济落后被动挨打,甚至影响到现代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对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形态进行深入研究,揭示我国封建时代商品生产相对繁荣,但商业资本迟迟未能引发社会经济质变的历史之谜,从而进一步了解古代中国国情,探讨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内在动因和社会条件,是现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自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古代商品经济的方方面面进行过认真地研究。据初步统计(含港、澳、台地区),凡涉及到古代商品经济的著作达 250 部之多,有关论文接近 3000 篇。其中不乏精心之作,可谓硕果累累,从而为我们对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纵观以往的研究成果:或对古代商品经济的某一部分,如《中国商业史》、《中国货币史》、《中国集市贸易简史》等诸层面;或对某

一时期,如《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等诸断面;或对某一地点及其具体问题,如《宋代南方的虚市》、《徽州典商》、《清代西藏与尼泊尔通商概况》等诸方面进行探讨,可发现对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从事整体的宏观研究却甚少。另外,以往的研究成果,虽然牵涉到古代商品经济的诸层面、诸断面和诸方面,但限于史料等各种原因,亦存在一些缺口或涉猎甚少的问题。就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商品交换领域而很少涉足商品生产领域;就时间而言,疏于隋唐以前商品经济的探讨而热衷于宋元明清时期的研究;就空间而言,倾注于中国腹地贸易而忽视边地及对外贸易,特别是中西古代商品经济的对比研究等。然而,这些薄弱环节正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进行整体宏观研究必须注意的重大问题或微观细节。

《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一书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现代商品经济理论的新视野,从某些微观细节入手,对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形态进行整体宏观研究。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识认之后才能理解。”^{〔1〕}我们只有立足于今天,才能更清楚地考察和反思历史的昨天。我国现代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日臻完善,促成现代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新热潮。本书作者正是在这股热潮的洗礼中,产生了重新审视古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冲动。实践与理论证明,集市贸易的表面繁荣并非一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成正比,中世纪时代西欧与同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就是明显的例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爆发前夕也是如此。因此,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的健全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良好社会环境以及国家政权适度的宏观调控机制。当然,历史不会完全重蹈覆辙。但是,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

我们也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历史的积淀与惯性未免泥沙俱下,不同程度地影响商品经济形态的正常发展。因此,也有必要立足于现实,利用现代化的手术刀,对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形态进行深入全面地解剖,洞察其长期缓慢发展的结症所在,以免再次陷入历史轮回的怪圈。马克思说:“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2]正因为如此,立足于现实既是本书写作的缘起和目的,也是本书研究的基本方法,所谓“以今鉴古”的研究方法。

恩格斯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3]因此,本书对古代商品经济形态的研究,以商品生产形态与商品交换形态为基本构架,形成两大板块。然后分别剖析其民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官营商品生产、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形态,以及贩运、屯积、接鬻、直销贸易,以经营货币为主体的特殊贸易(含借贷贸易、典当贸易、金融贸易),集贸市场、对外贸易、商人及其组织形态等;探讨它们各自的特点、发展状态、社会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本书以时间为支柱,撑起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这两大板块,不但考查其发展演变的历程,而且揭示其发展演变的社会原因。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4]本书根据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状态,分成上古与中古(封建社会)两个时代,

其中上古含原始时期与早期文明(奴隶制)时期两个阶段;中古含前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后期(宋元明清)两个阶段。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其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本书讨论的重点放在上古及中古前期而略于中古后期。于是,本书的论述方式与上述“以今鉴古”的研究思维方式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之所以在论述方式上作“厚古薄今”的安排,除了中古后期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外,我们认为“正本清源”更加有利于了解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实质。众所周知,世界各民族特点的形成,各国发展道路的千差万别,都与他们最初产生的生存环境有关。如果我们只要了解各国各民族的特点,当然以现实最清楚,但如果要进一步了解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则必须认真考察它们的起源。往往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隐藏在它们产生发展的初级阶段。然而,事物形成发展的初级阶段因年代久远,模糊不清,史料缺乏被人们所遗忘、放弃。因此,只有首先正其“源”,才能顺其“流”。如果不“正本清源”,而是中途介入,认识事物的起点偏离轨道,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正是本书在论述古代商品经济形态这个庞然大物时,采取“开源节流”方式的缘由。

无论是“以今鉴古”的思维方式,或是“开源节流”的论述方式,虽然不是作者的专利,但确是本书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其目的在于吸收以往优秀的科研成果,抓住古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基本内涵及其关键部位,充实其中的薄弱环节,以便正确阐释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运行规律及其社会根源;从而通过对古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全面批判,为现代商品经济健康迅速的发展铺平道路。

本书凡采用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般都在行文中注明。由于课题涵盖的内容庞杂、时段太长,而本人学识有限,行文匆匆,其中缺点自然不少,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感激不尽!

注: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2卷上,第108-109页。

[3] 恩格斯《反杜林论》;同上书,第3卷上,第186页。

[4]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的道德化》;同上书,第1卷上,第169页。

目 录

序言	1
甲编 中国上古时代的商品经济形态	
一、原始商品经济形态的起源与发展	1
(一)中国原始商品经济的萌生	1
(二)东夷部落与原始商品经济的发展	5
(三)中国文明形成之路与原始商品经济形态的 基本格局	10
二、早期文明时代的商品经济形态	15
(一)我国早期文明与商品经济的形成	15
(二)商与西周时代的商人及其商贸活动	19
(三)我国早期文明时代商品经济的特点	24
乙编 中国(中古)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形成与演变	
三、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的变革	32
(一)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生产的发展	33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流通形态	36
(三)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	43
(四)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形态产生的特殊 道路	48
四、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基本定型	51
(一)西汉前期商品经济相对自由的发展	52
(二)西汉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变态发展	55

(三)东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因循发展	59
五、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	63
(一)商品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	64
(二)商品生产形态的发展变化	67
(三)商品流通领域的发展演变	73
丙编 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形态	
六、私营手工业商品生产	78
(一)封建时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模式的确立	79
(二)动乱之中缓慢发展的私营手工业	85
(三)私营手工业生产的再度繁荣	89
七、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	101
(一)秦汉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	102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	107
(三)隋唐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兴盛	111
八、官营商品性生产	120
(一)封建国家垄断经营政策的形成	120
(二)封建国家垄断经营政策的发展	128
(三)官府从事的其它商品性生产	137
九、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势	144
(一)私营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动态	145
(二)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态势	154
(三)官营商品性生产的发展演变	165
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形态的基本特征	175
(一)主体结构特征	176
(二)部类结构特征	182
丁编 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交换形态	
十一、贩运贸易形态	197

(一)贩运贸易发展趋势	198
(二)贩运贸易经营状态	205
(三)贩运贸易估评	212
十二、屯积、接鬻、直销及官营贸易形态	216
(一)屯积、接鬻贸易	217
(二)直销贸易	222
(三)官营贸易	228
十三、货币经营贸易形态	242
(一)借贷贸易	243
(二)典当贸易	249
(三)金融贸易	253
十四、集贸市场形态	262
(一)农村集市	262
(二)城市市场	267
(三)边境市场	282
十五、封建社会后期国内贸易的发展趋势	290
(一)市场贸易的新发展	290
(二)全国水陆联运商路网络及其贩运贸易的发展	305
(三)官营贸易的发展	311
(四)货币经营贸易的发展	318
十六、封建时代的对外贸易形态	333
(一)官营对外贸易	334
(二)私营对外贸易	348
(三)市舶制度	364
十七、封建时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	379
(一)商人阶层的发展演变	379
(二)商业利润与商业资本运动	403

结语	417
后记	429

甲编 中国上古时代的商品经济形态

世界上任何人或物的成长都有自己的先天(胚胎)和童年。而且人(物)先天的孕育及其童年所形成的素质,对自身的发展演变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上古时代的商品经济形态,经历了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先天孕育阶段和早期文明(奴隶制时期)形成的童年阶段。同样,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先天及其童年状态,对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故本编对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形态的研究,主要在于探其源,以便顺其流。

一、原始商品经济形态的起源与发展

我国原始社会处于萌芽状态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业市场及商人、货币等等,有机构成原始商品经济形态。目前学术界对原始商品经济的探讨歧见较多。本文另辟蹊径,拟在现有考古、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真考查我国原始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途径及原始商品经济在我国社会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特点,以便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形态发展演变的源流。

(一)中国原始商品经济的萌生

原始商品经济萌芽于早期人类社会的物物交换活动之中。过去人们往往把交换的产生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原始农业、

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分离相联系,实际上并不确切。马克思指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民族等等。不同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 and 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1]可见远古时代地理环境差别引起的自然分工,各原始共同体拥有本部各具特色的自然产品,也是早期人类社会引发产品交换的基本条件。

处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虽然以采集渔猎为生,生产能力极为低下,但他们迫于生计到处流徙,且当时人类活动的地域范围比新石器时代更为广泛。据现代地理学研究成果,在第四纪更新世时期内(约距今 250 万至 1.5 万年前),大至相当旧石器时代,地球上曾发生过几次大的冰期和间冰期,冷暖交替,沧海桑田。当冰期到来之时,导致海平面下降 100—200 米,使渤海干涸,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大陆架均出露水面。这时我国沿海岛屿,包括台湾和海南岛等都成为大陆架上的山丘,而且到日本列岛也有陆桥相连,甚至通过东北部白令海峡的陆桥可以到达北美洲。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及其自然环境的差异,必然为原始人类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互相接触、交换自然产品提供更多的机遇。中日学者认为,其时远东大陆的旧石器文化可通过陆桥传达日本。裴文中先生曾指出,日本九州大分县的早水台遗址(约距今 10 万年)出土的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与我国周口店第 15 地点的文化遗物具有许多共同之处^[2]。这说明远古人类的交往能力极强。在距今约 1.8 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作为装饰品用的海蚶壳和散布在人骨周围的赤铁矿粉末,而它们都非本地所产。海蚶产于渤海湾一带,当时距山顶洞约四百里,赤铁矿产于宣化地区,亦相距二、三百里。他们应为山顶洞人通过交换得来^[3]。另

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山西阳高许家窑、襄汾大窑堆、太原古交镇,四川汉源富林镇,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遗址等,都曾是一些规模较大的石器制造场所^[4]。每个采制场都残存着大量经人工打制的石器、石片和石渣,而石器中又以半成品占多数。这些连续不断采制的石器,绝非仅供本地使用,应该被人们运往更大的范围,与那些缺少石料、石器的共同体进行各种形式的物品交换。可见处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虽然主要以渔猎、采集为生活来源,尚未正式形成农业、畜牧业和专业手工业,但地理环境差异及各个共同体自然占有权的确立,必然导致彼此之间自然物品或加工品的交换。据《民族志》记述采集、渔猎部族中进行交换的情况,其时各部族只是根据本部的需要,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换不过偶然进行,往往双方采取互相赠送礼物的方式,根本谈不上等价交换。

距今约 8000 余年,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全球气候转暖,海平面回升,台湾、海南岛以及沿海其他许多岛屿又与大陆分离。这时我国先民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以农耕、畜牧和手工业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其时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生活水准的提高以及对物质欲望的增强,各民族部落利用自然物品进行交换的现象更加普遍。尤其是这一时期独立手工业部类逐渐形成,由此萌发出原始状态的商品生产,因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交换的发展。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手工业生产有磨制石器、烧制陶器、制作木器、骨器、玉器以及编织、纺织、冶铜等。特别是专门制作石器、陶器和骨器的场所在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当然,氏族公社内部的手工业生产成品绝大部分供本氏族成员使用,不具备原始商品生产的性质,但每个氏族部落因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往往擅长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于是自然形成氏族部落之间的专

业分工,从而使这种手工业生产带有原始商品生产的意义。如在广东南海西樵山、湖北枝江马家溪、山西襄汾沙女沟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大规模的石器采制遗址^[5]。在甘肃东乡林家、永登连城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遗址及甘肃武威娘娘台、临夏秦魏家和大何庄、青海贵南朵马台等齐家文化遗址中,曾先后多次发现铜器。另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不少苧麻织物和丝织品,而且还有二百多件竹篾编织物等^[6]。可见新石器时代居住在上述各地的氏族部落分别以制石、冶铜、纺织与编织业著称。此外还有许多处于当时领先地位的手工业生产遗迹。这些擅长某种手工业生产的氏族部落,大多因地利之便得以发展起来。他们有的在自然物加工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扩大手工业生产;有的在拥有特质原料的条件下进一步取得手工业品的优势。这说明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仍带有原始性,而且各氏族部落生产的手工业品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才用于交换。因此,作为商品生产的原始性就更明显了。又随着新石器时代后期氏族内部父权制家庭或家族经济的出现,原始商品生产亦开始在专业手工业家族之中萌生。《吕氏春秋·君守》、《勿躬》所载:奚仲作车、胡曹作衣、夷羿作弓、仪狄作酒、虞姁作舟、赤冀作臼等等,大致反映出各家庭或家族所擅长的某种手工业生产带有原始商品生产的意义。

氏族部落以及家族为主体的原始商品生产先后出现,既是社会经济和物物交换发展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交换的扩大,由此形成我国最初的市场和商贸活动。《易·系辞》下记载:“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原始市场往往设在各氏族部落的交界处,以便彼此之间定点定时进行产品交换。由于交换活动经常化,所以各种交换的比例自然和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更加接近,于是逐渐形成以某种特殊物品来充当交换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